



盘根错节的 欧洲

〔联邦德国〕彼得·本德尔 著

PANGENCUOJIE DE
OUZHOU

世界知识出版社

462302



60643/2

盘根错节的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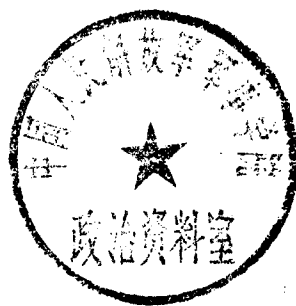
17

16

〔联邦德国〕彼得·本德尔 著

马灿荣 等译 陈景美 校

(内部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Peter Bender

Das Ende des ideologischen Zeitalters

Die Europäisierung Europas

根据联邦德国塞弗林和齐特勒出版公司1981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蒋红妹

封面设计：冯光美

盘根错节的欧洲

〔联邦德国〕彼得·本德尔 著

马灿荣 等译 陈景美 校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7.5 字数：174,0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150

书号：3003·1705 定价：1.45元

(内部发行)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

马灿荣	祝逸清	潘其昌
黄传杰	任友林	

关于《西欧译丛》的说明

战后以来，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欧美、苏联、东欧各国学术界和外交人士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陆续出版了许多新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同有关研究和出版单位合作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翻译并编成一套《西欧译丛》。这套《译丛》包括整个西欧及其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的作者有些是资产阶级学者，有些是带有偏见的，他们的观点，我们并不都赞成，但是这些著作在学术上有一定价值，而且资料是比较新鲜和充实的，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西欧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译丛》读者对象为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和涉外工作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和研究生，以及关心国际问题的、尤其是西欧问题的其他人士。

这套《译丛》将从1984年开始陆续出版发行。《盘根错节的欧洲》便是这套《译丛》的一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编译室

代 序

1981年联邦德国出版了一本引人注目的书，书名为《意识形态时代的结束》，副题为“欧洲的欧洲化”^①。

作者彼得·本德尔是联邦德国比较有名的记者，长期研究苏联、东欧问题，是联邦德国“东方政策”的谋士之一，曾发表过许多有关“东方政策”和德国问题的论著。《意识形态时代的结束》一书是他的近著，也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一部著作。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同两个超级大国拉开距离，逐步实现“欧洲的欧洲化”。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论述阿富汗事件和波兰危机后的欧洲形势。接着两章分别追述战后以来苏联和东欧的演变，以及西方对东方的政策的变化。第四章根据前文得出结论说，东方和西方都出现了“非意识形态化”，也就是说不再能够按照意识形态来划分西欧与东欧了。作者在第五章中论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二元论”对欧洲的危险，接着又在下一章阐述了欧洲与两个超级大国的不同利益。第七章谈论德国问题。最后一章提出了“欧洲的欧洲化”的前景。

作者认为，在阿富汗事件和波兰危机后欧洲形势的主要特点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霸权，而东、西两边的欧洲人都“与各自的盟主保持距离”，他们都试图“挽救和继续保持缓和”，都希望彼此“相互接近”。东、西欧

① 中译本书名是译者改的。——编者

的“相互接近”已是“不可逆转的”。这就为实现“从大西洋到布格河”（布格河是波兰与苏联的边界线）的“欧洲的欧洲化”创造了条件。

在作者看来，欧洲人与各自盟主的疏远开始于六十年代。当时，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东、西欧，“按意识形态划分”已失去其说服力，不仅“意识形态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在消退”，并且“欧洲的两个阵营都在瓦解”。欧洲的“非意识形态化”使欧洲人恢复了“欧洲的共性”，“欧洲”这一概念已经作为一个“参与竞争的价值观念”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作者强调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与欧洲的利益是不同的。这反映在地理、历史、文化和感情等各个方面，也表现为“安全利益”的不同。美国和苏联都是“准欧洲大国”。它们又同时都是“太平洋大国和世界大国”，它们有“全球战略利益”，因而只把欧洲看作它们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而欧洲人认为欧洲是他们的政策中心。欧洲人感到，欧洲在文化上既优于俄国也胜于美国，欧洲应该重建自己的“天然共性”。在安全问题上，两个超级大国与欧洲之间，特别是美国与西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西欧人认为，他们最能够对苏联的威胁作出恰当的估计，甚至施特劳斯也认为苏联并没有侵略意图。美国比较强调军事对安全的意义，西欧却认为安全问题不仅是一项“军事任务”，而且还需要一种“政治防卫”，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例如，通过东西方之间的经济交流可以保持“苏联对西方经济的兴趣”。西欧人还认为，欧洲的安全还需要克服两大国的“二元论”，既要“防备莫斯科”，也要“防备华盛顿与莫斯科的纠纷”。“深深地卷入两个大国的战略纠葛并不符合欧洲的利益”。相反，欧洲应退出大国的战略地位之争，退出大国的军备竞赛，并努力使“尽可能多的地区”脱离大

国的冲突。

根据上述分析，作者主张今日欧洲应该也可以推行一项“为欧洲着想的政策”，以求逐步实现“欧洲的欧洲化”，这种“欧洲的欧洲化”的进程可以设想为四个阶段。

（一）东西欧“自觉地、系统地”继续推进业已开始的彼此“相互接近”。双方都发挥自己的作用，促使各自盟主采取“克制”态度。

（二）欧洲国家争取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独立性。西欧率先在西方联盟中争取更大的“自主”地位。在此期间，东欧和西欧仍然承担各自的联盟义务，但“拒绝为大国在欧洲内外争霸服务的一切”。

（三）促进东欧内部的和平演变。在此期间东欧各国保持对苏联在外交和防务上的“忠诚”，但将获得在内政上摆脱“苏联模式”的行动自由。

（四）解散两大军事集团，使欧洲“重新成为欧洲”。这时，欧洲将再次发挥“世界作用”，既在美苏之间，也在“北方”和“南方”之间起稳定性作用。

关于实现“欧洲的欧洲化”的条件，作者认为，这将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南北矛盾的激化使白人工业国不得不更加彼此接近；中国上升为世界大国，从而使美苏都“伤脑筋”；欧洲内部关系趋于稳定，从而使美苏可以担当从欧洲撤军的风险。最后，作者强调说，“欧洲化”的进展主要取决于欧洲自身的发展。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欧洲形势激烈动荡。并且还有许多迹象表明，欧洲形势正在酝酿着新的变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版了本德尔的《意识形态时代的结束》一书。该书包含有许多荒诞的论述，还提出了一些目前看来不很切合现实的政策主张，但是它也反映了欧洲人民不愿听凭两个超级大国任意主宰欧洲命运、希望欧洲最终摆脱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

和干涉的强烈愿望。尽管人们对于书中最后提出的关于“欧洲的欧洲化”的几个阶段的设想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种设想的提出正说明了，在美苏两霸争夺加剧、国际形势动荡多变的情况下，欧洲人正在认真思考、积极探索欧洲今后的出路。

本德尔这本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它解答了多少问题，而在于它提出了许多问题，使人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欧洲的各种矛盾，虽然这一切也许并非作者的本意。欧洲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全球的战略重点所在。这里不仅有美苏争霸的矛盾，还有欧洲人民反抗两霸的斗争；不仅有东、西欧相互关系的问题与矛盾，还有东欧内部的问题与矛盾，西欧内部的问题与矛盾；最后还有德国问题以及环绕这一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矛盾。所有这些问题与矛盾交织在一起，盘根错节。而在其中，两霸的争夺和欧洲人民的反霸斗争始终是中心问题。

有人说，由于种种矛盾相互牵制，因此欧洲人民不可能独立自主。又有人说，正由于各种矛盾的相互激化，欧洲人民终将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们难道不是有着更多的理由可以肯定，后一种看法更加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吗？

由于作者的身份和该书的内容，此书一出版就引起欧美舆论的普遍关注。勃兰特在联邦德国《明镜》周刊撰写书评和文章，表示基本上赞同本德尔提出的观点，认为书中关于“欧洲的欧洲化”的四个阶段的设想是现实的。联邦德国其他政界人士、欧美一些报刊杂志也陆续发表了看法和评论。各方意见纷纭，褒贬不一。但在各种反应中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普遍认为，这本书提出了许多特别是在当前欧洲形势下引人深思的问题。

摘自《盘根错节的欧洲——评〈意识形态时代的结束〉》一文，见《国际问题研究》，1983年第2期。

目 录

代 序	(1)
第 一 章	1980年：阿富汗和波兰危机 (1)
第 二 章	东方——从革命到仿效 (9)
第 三 章	西方：惶惶不安与恢复镇静 (53)
第 四 章	东方和西方：意识形态分裂 的结束 (73)
第 五 章	大国：二元体制的危险 (95)
第 六 章	欧洲与大国：利益的差异 (127)
第 七 章	欧洲和德国人：问题的缓解 (178)
第 八 章	欧洲和欧洲的前景：欧洲化的 四个阶段 (203)
附件一	德国的爱国主义 维利·勃兰特
附件二	谈彼得·本德尔的著作《意识形态时代的 结束》前景的四个阶段 维利·勃兰特

第一章

1980年：阿富汗和波兰危机

共产主义不适合波兰人，因为他们过于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

——斯大林

1980年以政治上罕见的明朗性向欧洲人表明，什么东西在威胁着欧洲大陆。苏联占领了阿富汗，而当它认为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岌岌可危时，又从政治上钳制波兰。在一个场合使用武力，在另一个场合以武力相威胁——对八十年代所作的不良预言竟然这样迅速地实现了，甚至超出了预言者自己所能相信的程度。东西方关系日趋紧张，缓和看来已经完蛋。

在阿富汗和波兰所发生的事件虽然出自同一根源，即被压迫人民要求自决和苏联的霸权主义欲望，但是，它们对国际政治造成的后果却迥然不同。入侵阿富汗是苏联在其势力范围之外的一个扩张步骤，是对石油产区的威胁；而在波兰即使发生苏联出兵干涉的最坏情况，也仍然是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暴力行动，和1956年对匈牙利起义的镇压以及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阿富汗事件曾经一度孕育着爆发大战的危险，而波兰问题最多只能引起一场冷战。

自从1962年尼基塔·赫鲁晓夫企图在古巴驻扎苏联导弹，结果由于约翰·弗·肯尼迪的坚定和明智而被迫撤退以来，核战争的可能性看来越来越小，甚至几乎不可能了。有关核战争的想法也已经从公众的意识中逐渐消失。东西方中的每一方虽然还在预防另一方的突然袭击，但是已不再认为这种袭击真的会发生了。总的来说，人们不再过多地关心东西方问题，而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内部困难和未来的冲突——南北矛盾方面，在西方尤其是这样。

确实，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专家们看到了，正是在这方面形成了新的危险策源地。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南北之间是不可能发生核战争的，而东西方之间也很少有这种可能，但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却有可能出现爆炸性形势。这是指在第三世界，大国之间——可能为争夺石油和原料而情不自禁地——相互冲突并最终蔓延成世界大战。1979年底，不但莫斯科在阿富汗，而且在同一时间内华盛顿在伊朗（因使馆人质事件）也遇到了麻烦，几乎要采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于是，理论家们的担心具有了现实性。阿富汗和伊朗危机可能合二而一，苏联和美国的武装部队可能迎头相撞，这曾经是世界各国许多政治家的忧虑所在，不少人甚至公开说出了这一点。

爆发一场战争似乎又有可能了，但是同五十年代相比，却出自不同的原因。现在，不再是对方的突然袭击，也不再象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冒险时采取的那种蓄意挑衅，而是两个大国的不可捉摸性引起了人们的恐惧。八十年代伊始给予人们的第一个经验是，主要的危险已经不在于对手，而在于对立；问题不在于是否怀有恶意的企图，而在于莫斯科和华盛顿的轻率作为所造成的恶劣后果。这里不禁使人想起，大多数战争并不是有意挑起而是逐渐酿成的。几乎在世界各地仍然支配着当今掌权者的世界观的那个希特勒，并非常态，

而只是例外。真正能够同今天的形势相提并论的不是1938—1939年那一段时间，而是1914年前后；使人担忧的并不是所谓的“绥靖”和“第二个慕尼黑”，而是轻举妄动，加上害怕丢失面子和妄自尊大。没有什么能比赫尔穆特·施密特下面的话更为确切地反映德国人甚至欧洲人当时的情绪了：

“我们再也不能逞强和装作啥也不怕了。我们为此已经受够了。”

阿富汗事件引起的危机之所以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类似的事件，是因为：它是第一次使联盟没有因而得到巩固反而遭到分裂的东西方冲突。自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成立以来，最能使各自的联盟迅速而有效地团结起来的東西，莫过于同另一个“阵营”的冲突了。在策略问题上联盟内部有时会出现意见分歧，但是一旦出现危急情况，联盟的团结总是高于一切。紧张是最好的联盟粘合剂，两大联盟甚至都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当联盟内部的“警惕性”或者各国的军事预算因缓和而可能受到损害时，有关人士就会出来把敌人的形象描绘得狰狞可怕。

1980年初，这种机制作用第一次失灵了——对双方来说，情况都是如此。在苏联占领阿富汗问题上，只有美国人和俄国人陷入了冲突；从布格河至大西洋之间的欧洲人都同他们的盟主保持了距离。甚至东欧的领导也毫不隐瞒他们对莫斯科的军事行动采取拒绝态度，在这一点上，那边的领导和人民是完全一致的。西欧人对克里姆林宫暴行的谴责并不亚于美国人，但是他们却拒绝同美国一起奉行同莫斯科对抗的政策：经济禁运，抵制奥运会，限制科学文化联系等等——大多数国家对此进行了延宕反抗。欧洲人虽然对盟主信誓旦旦地保证，要保持“牢不可破的”团结，也不拒绝形式上的服从，但是，他们却把政治精力集中于如何使危机远离本大陆。看来，在一段时间内，华盛顿或许还有莫斯科，同自

已盟友之间的麻烦不亚于同对手的麻烦。

东西方边界两侧的欧洲人都试图挽救缓和并尽可能继续推行缓和；对此，东欧国家的政府甚至比西欧更为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踌躇之后，莫斯科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表示愿意使欧洲的东西方合作关系不受干扰；东德^①则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以引人注目的坚定态度这样做了。于是，在德国战后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苏美关系长期以来从未象现在这样恶化，而东西德关系自从两个德意志国家成立以来却从来没有这样好过。

当然，联盟仍然是东西方关系中最强有力的结构。欧洲两边的政治家们都知道，如果两个大国之间的对立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他们将不得不重新回到原来的阵线中去。但这里强调的是“不得不”，因为美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距离越大，欧洲人在看法和意图上就越发相互接近。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越是不可调和，欧洲大陆的居民就越会发现并感到他们有必要取得一致。现在，一个新结构的轮廓已清晰可见：一方是由于互不信任和争夺而对峙的两个大国；另一方是狭义上的欧洲人，他们由于已被确认的相互信任和对本大陆安宁的共同担忧而连结在一起。

波兰危机产生的影响同阿富汗危机正好相反。因为阿富汗事件使得欧洲缓和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但缓和却因波兰事件而面临危险。在德国——这块欧洲最为敏感的地区，最容易感受到这一点。1980年初，波恩和东柏林^②前所未有地相互接近，而到了年底，相互之间又出现了多年来未曾有过的疏远；东德把强制旅行者每天兑换的马克数量增加了一

① 原文如此。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下同。——译者

② 原文如此。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柏林，下同。——译者

倍(在柏林是翻两番), 加上发表了些一相应的讲话, 从而使得相互之间的鸿沟重新扩大了, 对许多人来说成为无法逾越的了。

原因很清楚。波兰独立工会的成立, 可能成为其它共产党国家工人效仿的样板。按照在东欧到处流行的斯大林主义国家观, 党的领导必须控制一切, 几百万独立的、组织起来的工人对一个共产党国家来说, 看来是有致命危险的。东欧各国领导, 甚至包括罗马尼亚在内, 之所以一齐对波兰施加压力, 原因就在于它们对自身的政权和制度感到担心。因为一切坏东西都是来自西方的, 或者是有利于西方的, 于是处在东西方最前沿的东德就停止了同波恩的契约政策, 并企图通过建立财政壁垒来保护自己免受西方影响的侵蚀。

尽管变化如此剧烈, 但却并不意味着东欧国家的西方政策已根本转向, 因为波兰事件并没有改变东德、苏联和整个东方“阵营”的利益所在。促使它们先前同西方进行缓和与合作的经济和政治原因今天仍然存在。在东方领导者们看来, 波兰事件同1968年的布拉格事件和1979年的阿富汗事件一样, 都是“意外事件”; 为了同西方继续合作, 必须克服或者消除这些危险的干扰。首先是安全, 然后才是缓和——这句话倒也绝不是仅适用于东方。只有当本身的联盟足够稳定时, 才可以同另一个集团保持较为接近的关系——这一点无论是在北约还是在华约内部, 都是没有争议的。

所以说, 欧洲的缓和较好地经受住了阿富汗事件的影响, 却受到了波兰事件的威胁。当本书付印时, 还不能预见今后维斯瓦河畔的事态发展。但是, 为什么1980年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 其原因却是清楚的。欧洲的缓和一会儿得到了确认, 一会儿又受到了威胁, 联盟在这一次危机中分崩离析, 在另一次危机中却又表现得团结一致; 最后还有在波兰发生的变动——所有这一切有着一个共同的根源: 这都是近

二十年来业已发生的变化的反应，这种变化如同其它所有的深刻变化一样，几乎是不为人们所觉察的。

波兰危机有某些波兰特有的原因，但就其实质来说，乃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危机。从堪察加到易北河，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得不同共同的困境进行周旋。区别仅在于：“下层”不得不承受这一困境，而“上层”则企图把它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在政治上东方已失去了它区别于其它世界的东西——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已不再是一种动力，而只是一种标签；革命者的信仰已经僵化，变为领导干部的教条。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都受到一种制度的制约，而这种制度已不能适应时代的任何要求，除了借以维持统治之外毫无用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曾试图使这种制度适应本国的要求，结果他们的国家被占领；1980年，波兰人试图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制度，实现自己迫切的愿望。

精神上的（但不是礼仪上的）非意识形态化带来了深远的后果。易北河以东的国家已变成普普通通的、正规的国家，只不过是受到专制主义的统治，并且有着一套意识形态的说词而已。正规的国家同其它国家有着正常的关系，它可好可坏，但这种关系不再建立在同其它一切根据不同准则生活的国家的无法调和和不可克服的对立之上。“正常化”，这一看来是空空洞洞的公报词语，实际上却是一个关键性字眼。它标志着东西方之间业已实现的原则性变化。

人们可以把奉行缓和政策说成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但经济合作就不能说是一种策略；欧洲人包括苏联在内正在谋求今后几十年的合作，签订了直至本世纪末、甚至更长时间的合同。这一切在五十和六十年代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它意味着双方都承担了相互有限依赖的风险，对他们来说，“东方”或“西方”的问题已不再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了。

同所谓的“阶级敌人”建立长期的经济联系，是否同那种据说要为阶级斗争、即击败经济伙伴创造尽可能有利条件的“和平共处”政策相一致呢？“国际分工”（阿富汗事件后重新强调）的目标和“世界革命”的目标能够吻合吗？特别是鉴于当时的国家集团在经济上并不如其对手，这一切能够相容不悖吗？今天应该怎样看待列宁那句经常被引用的关于所谓资本家最终将提供用来绞死自己的绳索的名言呢？统计数字告诉我们，一旦关系全部中断，东方经济将比西方经济遭受更大的打击。

欧洲的分裂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分裂，而仅仅是政治上的分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虽然各自都以自己的方式、以进步的卫士和先驱自居，但是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角逐与周旋，无不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地位和担忧对方可能增强地位。世界既不会因而变成民主主义的，也不会变成共产主义的。莫斯科和华盛顿虽然有能力毁灭整个地球，但却没有力量统治它；它们之间的冲突同以往历史上大国之间的所有冲突一样，是很寻常的冲突——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冲突因此就不那么危险了。苏联人对阿富汗的占领，美国人对此的歇斯底里，这一切都起因于双方内部的虚弱和相互争夺，这种争夺今后还将继续下去，而欧洲除了自身的问题之外，还将继续受到美苏争夺的影响。

欧洲人同各自盟主在看法和利益方面互不相同，六十年代这个问题日益突出。当时，以意识形态来划分世界已逐渐失去说服力。由于问题已不再是要么“生存”，要么“死亡”，也不再是好的原则战胜坏的原则，因此联盟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北约和华约都由信仰共同体变成了利益共同体（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本来也就是利益共同体）；联盟内部不仅为了钱而争吵不休，而且围绕政策所进行的争论也越来越频繁。大国仍然把东西方关系看作是全局性的，并且期待